

探源云南

# 设置郡县对西南地区的经略与影响

张兴林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西汉统治者根据秦朝与自己切身的经验，认识到因故俗而治和实行轻赋税，是巩固西南地区边郡行之有效的办法。古代的西南夷(蜀汉称南中)，范围包括了今云南、四川南部及贵州西南部分地区。西南地区虽地广人稀、经济

### “固边安内”，以其故俗治

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经济空前壮大。《史记·平准书》中有记载：“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为汉武帝进行一系列开疆拓土计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疆不安定问题上有了日程。《盐铁论》说：“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氏、僂、冉、騫、菴唐、昆明之属，抗陇西、巴、蜀。”当时边疆不宁的情形多点爆发，日益严重。针对边疆乱象，以北却匈奴，南伐南越，西通西域一系列军事策略，击退了自秦汉以来经常侵扰边境的匈奴，消灭南越割据政权，确保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在收服与治理过程中，汉王朝总结秦朝和自身的经验，深知“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于是采取“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消劲越”的策略。

第一步是打通交通要道，固边安内。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为开通西南夷道，汉朝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可见其重要性。唐蒙等出使南越，在南越吃到四川产的枸酱，发现了自蜀通番禺(今广州)的牂牁江，并得知江边有夜郎国，于是建议：“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奇不意，此制敌一奇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邛竹杖、蜀布，于是发现有道自蜀通大夏，乃回报武帝：“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可见，打通西南的各条道路，有利于安定西南各少数民族。

在开通西南夷道，降服西南部分地区后，汉王朝开始在平定区域设置郡县，以图有效统治。在夜郎地区设置了犍为郡，

在滇池地区设置了益州郡，“平南夷”设牂牁郡，在邛都设越嶲郡。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西汉益州西部六县及新归附的哀牢人、鸠僚、闽濮等人居住区设置了永昌郡。汉朝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不仅比秦朝的更为完善，而且明确了西南地区西部和南部的郡县属于边郡的范畴。

汉王朝设置郡县，采用的是羁縻的治理方式，即“以其故俗治”，承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不强行改变当地民族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羁縻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羁，马络头也；縻，牛鞵也”。《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羁縻作为一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确定下来的，全名叫羁縻州，是政府在边远地区设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代替行使权力，多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其目的在于控制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以保证交通要道畅通，达到稳定西南夷、安定内地的需要。

这种松散式的管理使得中央王朝对其无法施行有效的直接统治，多种问题逐渐凸显。一是局势不稳。《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数反”之下，岂有稳定可言？所以不得已只好建议停止开发西南夷，集中力量解决匈奴问题。其二是政令不通。中央虽派驻流官，但流官的治所仅是一些孤立的据点，管辖力量有限，这就使中央政权不能直接在这些地区全面有效行使权力，且当地少数民族又各自为政，政令不畅自然成为一种常态。其三是赋税不定。由于统治力量不足，赋税难以正常征收，只能征收一些象征性贡赋，目的在于宣示统治权。

### 分而治之，实行全面统治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一分为三。南中(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及缅甸东北部)许多掌握部曲(借指军队)的汉人上

落后，但它对内地的安定却有着重要作用。因而，自秦代便开五尺道，至汉代耗用大量人财物力开辟通道，收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羁縻郡县(即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以治理之，开边疆设郡县之首，至三国时期，边郡治策兴盛安定。秦汉以来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目的各有不同，治理力度和方式也有差异。

层人士，史书中称为“大姓”，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头领，史书中称为“夷帅”“夷王”，乘机扩大势力，各自据地称雄。滇东、滇中有雍阰、孟获、朱提，牂牁郡有朱褒，越嶲郡有高定元。这些地区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西南夷地区成为蜀汉政权的后方，由于大姓夷帅称雄割据，蜀汉政权在初期自然难以对这些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尽管蜀汉政权主观上期望降服这一地区，并派太守之类的一些官员去履职，但实际操作上仅能“遥领”所辖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章武三年……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龚禄往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至此两汉设置的羁縻郡县已趋于名存实亡。

基于此，蜀汉政权出于“鼎立”和一统天下的需要，须改变过去治理西南地区的方式，于是设置庾降都督，对南中实行统一的军事统治。庾降都督的设置有两层用意：其一，面对南中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为平定南中，结束各地方势力称雄割据局面，必须实行军事强制，以武力实现安定；其二，由于东汉设置的郡县已名存实亡，而此时蜀汉又无力在此构建有效的统治体系，只能在诸郡之上设置一个军事统领机构，即庾降都督“立此职以总摄之”，以服务蜀汉的“复汉大业”。

南中地方势力的强大，成为蜀汉后方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三国志·蜀书十三·李恢传》：“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凡此种种，不但危及蜀汉政权的稳固，更有碍蜀汉统一天下、光复汉室的霸业。这就促使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出师北伐之前下决心先征服南中。自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起，蜀汉分兵三路南征，诸葛亮亲任将军三渡泸水，七擒孟获，征平南中。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降服了孟获这样的地方大姓，不但战争取得胜利，民心亦归顺。如此，诸葛亮不仅取得了控制南中的主动权，还为下一步强化治理奠定了基础。

征平南中后，蜀汉政权“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将两汉设置的越嶲、牂牁、

益州、永昌四郡部分为建宁、云南、永昌、牂牁、兴古、越嶲六郡，加上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设置的朱提郡，成为“南中七郡”。将四郡化分为七郡，其目的在于对南中地区各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使地方势力难以做大甚至联合反叛。至此，蜀汉政权的力量才得以深入南中，实现全面统治。

南中七郡设置后，仍归庾降都督统辖，但此时的庾降都督已由一个管理南中事务的军事机构发展成了蜀汉政权的一个政区。在这个政区中，蜀汉政权采取了与两汉不同的治理方式，以改变南中社会经济状况，发展生产来达到安定后方的目的。诸葛亮采取了迁徙南中大姓豪富到成都，削弱南中地方势力；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改善民族关系，如孟获翟官至御史中丞；发展农业生产，为大姓分配部曲(借指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等有效措施和办法。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南中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杨慎《滇载记》载：“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为诸葛亮北伐提供了有利条件。

两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与蜀汉政权征平南中、设置七郡，其目的都是为了内地统治的安定与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两汉时期实行的是“羁縻”政策，是松散型管理，而蜀汉时期对南中的治策不仅消灭了地方割据势力，设置的郡县还起到了巩固政治、发展经济的作用。《三国志·蜀志·周传》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自丞相亮南征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由此可以说，蜀汉在南中设置的郡县具有了政区性质，这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治理方式的重要改变。这种改变，对云南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秦汉以来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目的和作用有所不同，其背后反映了中原王朝统治力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对西南地区经略方式的改变。

(作者单位：玉溪市党校)

改革开放45周年

云南故事



牛洛河茶园基地

## 牛洛河茶厂与“三结合一体化”

杨燕

在三江环抱，“一眼望三国”的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牛洛河村是江城县中老边境上一个普通的村子。1985年村里有1000多人口，耕种着1300亩水稻，1100多亩轮歇地旱稻，在坡地上种养子、苞谷1400多亩，几乎所有土地都用来种粮食，但是广种薄收，刚刚能够吃饱。1987年，江城县人民政府与国营江城农场签订了联营开发牛洛河的协议，由国营农垦茶场与牛洛河村公所联办牛洛河茶厂，走出了一条“三结合一体化”开发经营模式，改变了这个村子的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牛洛河村都面临着种地吃不饱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现实困难。办法是想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改革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想在前面，走在前面，针对牛洛河村自身土地情况，分析了现有的资源条件，联办牛洛河茶厂成为了江城县委、县政府的解困思路。面对融资困难，农垦农场向世界银行和亚行贷款，加上县里给的一部分扶贫款，在近5万亩的国有和集体荒山上办茶厂，搞开发。又在牛洛河村1100多农民中选拔400多人组建茶叶专业队，并向外招聘了上千人。任命云南农业大学茶叶系毕业的袁明德当厂长，又派出40多名技术工人当骨干，吸收了8名中专技术员。他们把先进的种茶和制茶技术成套建成制地带到牛洛河，对全体茶农进行技术培训。先作示范，再手把手地教，组织现场培训近千次，每个茶农参加的培训至少有15次。还送出两批茶农到江城农场和大渡岗茶场学习茶叶加工技术。举办为期一年的初级技术班以及三年制农函大中专班，让本来对种茶知之甚少村民初步掌握了丰产茶园的栽培管理技术。有了技术还要有制度，茶场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实行层层承包管理，将责任落实到每个茶农，产出效益与工资挂钩，落实奖惩制度。在这样的管理下，茶农仅采摘鲜叶平均收入达1500元，高的达2840元。

1988年开始到1991年，牛洛河建成万亩高产密植速生茶园，1992年投产6000亩，产茶8000担，亩产133斤成品茶，逐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宏伟、设备齐全的茶叶精制加工厂。面对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茶厂积极走出去，成立经销科，四处推广销售，在思茅、昆明、天津等地设点销售，邀请省内外专家、各级领导到茶厂品鉴，县党政领导也亲自为产品推广宣传。经过多方努力，牛洛河茶厂的产品声誉逐渐传开，与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订立了产出的红茶每年80%交由该公司出口的合同，彻底改变了过去产销脱节、农工商分离的状况。

1988年开始到1991年，牛洛河建成万亩高产密植速生茶园，1992年投产6000亩，产茶8000担，亩产133斤成品茶，逐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宏伟、设备齐全的茶叶精制加工厂。面对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茶厂积极走出去，成立经销科，四处推广销售，在思茅、昆明、天津等地设点销售，邀请省内外专家、各级领导到茶厂品鉴，县党政领导也亲自为产品推广宣传。经过多方努力，牛洛河茶厂的产品声誉逐渐传开，与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订立了产出的红茶每年80%交由该公司出口的合同，彻底改变了过去产销脱节、农工商分离的状况。

茶叶叶变成了“金叶叶”，致富了一方百姓。牛洛河村的1700多亩轮歇地、二荒地、陡坡地通过退耕还林还茶，每年兴修水利，推广杂交稻、增施肥料等科技

术，人均只用1.5亩耕地种粮，反而人均纯收入414元，翻了一番；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水土不再流失，牛洛河也成为江城县卖“万斤粮”最多的行政村，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的发展方式。建起了现代化茶厂后，当地山山通公路，村村点电灯，不仅办起一所现代化完全小学，建了电视卫星接收站，还成立了电影放映组。吸引了全县6乡2镇贫困乡村的3000多名农民及家属聚集到牛洛河。外县的贫困群众也纷纷搬迁而至加入生产，有的甚至“自带口粮、自带工具、自建住房”，逐渐聚集成生活集市，还定期赶起了“乡街子”。少数民族农民成为了拿工资的新型农民，极大地激发了发展动力。闭塞落后的边疆哈尼族、拉祜族村，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新变化，沉睡千年的荒草坡变成四季常青的茶园，牛洛河这个山沟里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繁荣向上的新景象。

1992年12月2日至19日，云南省委调研组赴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进行调研后发现，除了江城县牛洛河茶厂之外，普洱县茶叶公司和普洱县勐先乡联合开发的板山茶场，普洱县外贸局与冈龙潭坝村公所联办新式茶园及新建的茶叶加工厂，思茅县供销社与大开河村联办的咖啡种植基地及新建的咖啡豆加工厂等，都采用了城乡结合、规模化、新科技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重点总结江城牛洛河茶叶商品基地建设经验和普洱板山茶场的经验后，形成了《关于加快边疆民族山区生产发展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三结合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即实行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经营体制。1993年1月省委下发《调查报告》在全省推广“三结合一体化”思路，各地迅速掀起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的热潮。到1994年，云南省共建立起30多个商品粮基地县、25个甘蔗基地县、30个优质茶产业基地县、31个商品猪基地县、21个牛羊商品基地县和5个禽蛋基地县。

“三结合一体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云南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探索出的解放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力、推动云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江城县牛洛河茶厂以及其他一些茶厂、茶园在建设发展中探索出的一些好的做法，经过省委调研总结，提出了“三结合一体化”经营体制，为当时边疆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发展指明了道路。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



充满岁月痕迹的悠悠古道



连接内外的贸易要道



新时代的“马帮”



荒弃的古道

在云南省中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武定，东邻禄劝县，南与禄州市、富民县毗邻，西与元谋县接壤，北与四川会理市隔金沙江相望，境内群峰叠翠，河谷纵横。武定是唐宋时期雄冠西南三十七部之首的罗婺故部，也是元明时期威震一方的彝族凤氏土司发祥地，素有“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之称，是出滇入川的重要通道。

据《经世大典》中记载：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间，辟昆明经富民、武定至四川成都之驿道。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按：“此为川滇交通之重要路线”。武定是川滇茶马文明古道上的要津，是云南通往省外的重要驿道之一。元朝时期开辟的驿道共设置24个驿站，武定境内有和曲驿(武定)、虚仁驿(白路)2站。至公元1912年，武定境内的古道共有10条，这10条古道的具体路线分布是：姜驿经元谋到达武定；武定经冷村、富民至昆明；环州至武定；慕莲(今万德乡)经康熙、插甸至武定；羊街经猫街至武定；猫街经隆庆关至罗次；九厂经羊旧至者北；高桥经窝堵、天鹰至武定；猫街经永泉、马场至

九厂、大猪街；九厂经白花山至仁兴。10条古道的里程约有10000多公里，是文明贸易流通的主要渠道，也是川滇茶马文明古道上的黄金古道，每日有成百上千的马帮匆匆忙忙地往返在这条古道上，充满着生机活力。

除了纵横于武定崇山峻岭中的茶马古道，武定还有几条特殊的驿道。1950年底，明代雄踞一方的罗婺部凤氏土司后裔那氏土司在万德设慕莲土司衙门，其统治期间开辟了3条古道，一条是从慕莲土司衙门通往环州李氏土司府之间的古道，这条古道全长50多公里，古道的开通便于两家土司之间的往来；另一条古道是通往衣衣热水潭的古道，热水潭是武定境内最好的天然温泉水，古道有30多公里，成为了土司到热水潭洗澡的专用古道；最后一条是从土司衙门至武定城的古道，古道经过大黑山、发窝、康熙、老木坝、插甸、天鹰、古柏，最终直达武定城，这条古道全长170多公里，是土司府通连外界的黄金通道，每天至少有30多匹武定矮脚马驮着土特产沿这条古道运达武定城里，再把武定城里的布匹、食盐等生活用品驮回金沙江

峡谷的土司府中。3条古道全长有200多公里，用条石铺成，并镶有石板，道宽有1.5米至2米，而今虽已荒凉弃用，但它记载着慕莲那氏土司统治期间灿烂的历史。

古道是武定生产生活之需，也是连接文化与思想的通道。千百年来，一条条古道上每天都有成百的马帮队伍走过，那清悠的马铃声和欢快的马蹄声回荡在深山峡谷中，成为一支四季回响的歌谣，马帮文化也成为武定民族文化中重要的一页。有古道和马帮就自然有马店，在深山峡谷中的古道旁，一座座马店因时而建，使在古道上奔波一天的人们有一个歇脚之处。据《武定县志》中记载，那时可容纳上百赶马人和马匹食宿的马店共有12家。12家马店的名字多以地名而设：慕莲、马德坪、发窝、康熙、白露、石腊它、马安山、武定、冷村、鸡街、天鹰、冷饭桥，每一座马店里时常欢声笑语，人们可以根据行程中途经路段选择投宿到自己心仪的马店歇脚，对于他们而言，马店就是旅途中的家。而这一座座马店也记录了文明的演进、历史的变迁。

古道不仅是商贸流通的黄金古道，也

是古时的军事战略之道，从元代开始很多古道都设立了驿站以利传邮。《元史·兵志》中记载：“站赤者……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到了明代以设驿置急递铺，递送紧急公文，在武定境内的有和曲驿、虚仁驿、环州驿、姜驿等驿站。清代改为驿站、递铺，武定境内有州前铺(今武定城)、尖山铺、里仁铺(今冷村附近)、麻地铺、天鹰铺、以坝铺、者昌铺(今禄丰大猪街附近)、白花山铺8处，每处雇役铺兵12名。古道、马帮、马店、驿站给武定带来了商业繁荣的景象，客棧、饭店、小吃摊依站而建。至清咸丰年间，江西、四川部分行商者在武定古城和高桥古镇定居，逐渐形成了武定古城和高桥古镇两个较大的商业市场。

悠悠古道，马蹄声声，漫长的岁月里，这一条条古驿道上走过马帮小贩、商贾官吏，也走过文人墨客、行者游侠。如今大部分古道都已荒弃，然而古道石板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经岁月刻印的裂痕，无不在诉说着它曾经的繁盛光景，以及值得为后人所留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